

從「康黨」到「亂黨」

陳獨秀早期思想和活動新探

李達嘉*

陳獨秀是近代中國思想史和政治史上的重要人物，考察他早期的思想和活動，有助於真切了解他的思想發展脈絡。過去學者在這個方面雖然已經有不少研究，但是史實敘述有錯誤，觀點也有值得商榷之處。本文重新梳理他晚清時期的思想和活動，主要的論點有四：第一，1903年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召開拒俄演說會，是他首次公開領導政治活動。這次演說會被視為安徽革命運動的開端。本文從文獻發現他參與創辦安慶藏書樓，指出他因此和安慶趨新之士有更密切的往來。這項發現釐清了他於1901年首次前往日本留學的背後因素，同時解答了他1903年得以在藏書樓召開拒俄演說會的原因。第二，陳獨秀於1903年創辦皖城愛國會，過去的研究因為引用資料錯誤把時間誤為1902年，並且作出他此時已由「康黨」轉為「亂黨」的論斷。此項錯誤已傳襲四十年。本文考據文獻史實，對此提出糾謬。第三，由於陳獨秀在民國時期思想和政治方面都具有開創性的影響，許多學者不免對他早期的思想和政治活動作了過高的評價。本文指出，他在晚清安徽地區是思想和行動的先驅者，但是影響是地區性的。他對國家思想、科學、民主的闡述都是很基本的知識，沒有超過梁啟超等人論述的範圍。第四，陳獨秀思想的重要內容，包括國家思想和進化論觀點，都受到康有為、梁啟超的啟蒙。他從改革派轉變為革命派以後，還是抱著從根本改造的信念。梁啟超對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民國初年。

關鍵詞：陳獨秀、梁啟超、康黨、亂黨、安慶藏書樓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一、前言

陳獨秀(1879-1942)在中國現代思想史和政治史上都是革命性的重要人物。他在民國初年創辦《新青年》，對中國舊禮教展開全面攻擊，發動思想革命；又和胡適(1891-1962)提倡白話文學，鼓吹文學革命，對後來學術思想的發展形成重大影響。緊接著他創立中國共產黨，推動無產階級革命，以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為目標，徹底改變了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路徑。以他在中國現代史上的關鍵地位來說，應該老早就學術研究的重要對象，但是在 1978 年以前卻沒有顯著的研究成果。主要的原因是在他在中共黨內路線鬥爭失敗以後，長期被冠上「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反革命份子」、「黨的叛徒」等罪名，陳獨秀研究在中國大陸被視為禁區，資料也沒有公開，使海內外相關的學術研究受到阻礙。鄭學稼(1906-1987)1987 年在臺灣出版《陳獨秀傳》，他的兒子鄭慶慈就指出，早在陳獨秀去世時，鄭學稼就立下志願要為陳獨秀寫一本「公正實在的傳」，但是因為資料缺乏，遲遲無法如願。¹陳獨秀研究出現轉機，是在 1978 年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改革開放政策以後。在實事求是的方針下，許多過去被視為禁忌的資料公開了出來，儘管中國學術界有人戲稱「陳學」是「險學」，但是仍然吸引許多研究者「鋌而走險」投入研究。²臺灣、香港、日本、美國等地學術界也因為資料取得較前容易，更是毫無忌諱地對他展開研究。

陳獨秀一生經歷曲折，著作浩繁，思想龐雜。四十多年來，由於新資料的發掘以及許多研究者的投入，相關的學術研究成果相當豐

1 鄭學稼，《陳獨秀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頁 1-2。

2 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文集》(香港：新苗出版社，1999)，頁 379；祝彥，《陳獨秀思想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前言」，頁 1。

碩。主要呈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討論他在《新青年》時期的言論思想，評述他在新文化運動的角色和影響。林毓生對陳獨秀反傳統思想的分析，是其中的經典之作。³二是論述他建立中國共產黨以後的政治活動，包括領導無產階級革命、黨內的路線之爭、晚年的政治境遇等，同時涉及他此一時期的思想。而在蘇聯檔案解密以後，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之間的關係也得到進一步解析。相較而言，關於他早期思想和活動的研究則顯得較為薄弱。所謂早期，指的是 1911 年以前的晚清時期。他此時光芒還未顯露，影響尚未形成，或許是不易引起研究興趣的一個原因。而更重要的是相關的資料有限。此一時期他的著作得以留存下來的只有將近二十篇淺白的論說文，主要刊載在《安徽俗話報》上，另外還有一些詩作。⁴他的自傳只寫到 1897 年 19 歲參加江南鄉試落榜，以後付諸闕如；此外，和他同時代人對他早期的記述也很少。由於資料不足，自然限制了研究的開展。

學界較早對陳獨秀早期事蹟和思想進行深入研究的是陳萬雄。他在 1982 年出版的小書，詳細敘述了陳獨秀的家世、婚姻、求學過程，以及 1915 年以前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在資料蒐集、史實考證和思想分析等方面都頗下功夫，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⁵以後一些學者陸續發掘新的資料或進行考證，增進了我們對陳獨秀早期事蹟的了解。鄭學稼、唐寶林、任建樹(1924-2019)、沈寂等學者為陳獨秀寫的傳記，有關他早期的部分，便都利用這些後來發掘的新資料，作出更為豐富而深

³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56-81.

⁴ 參見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卷 1。

⁵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人的析論。⁶不過，筆者探討陳獨秀的民主思想，仔細研讀他早期的相關資料，發現以往的研究在史實敘述上有錯誤，觀點也有值得商榷之處，因此重新解讀文獻，考證史實，撰成本文，以就教於方家。主要的論點有四：第一，1903年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召開拒俄演說會，是他首次公開領導政治活動。這次演說會被視為安徽革命運動的開端。但是，以往的研究對陳獨秀和安慶藏書樓有何淵源不甚了了。本文從文獻發現他參與創辦安慶藏書樓，指出他在此過程中和安慶崇尚新思想的人士有更密切的往來。這層人際網絡是他1901年首次前往日本留學的重要助力。這個發現同時解答了他1903年何以能在藏書樓召開拒俄演說會的原因。第二，陳獨秀於1903年創辦皖城愛國會，是他轉向革命派的重要指標之一。陳萬雄因為引用資料錯誤把時間誤為1902年，以致陳獨秀在這兩年的活動混淆不清。後來的研究未經細察，相襲引用，甚至作出他此時已由「康黨」轉為「亂黨」的論斷。此項錯誤已傳襲四十年之久。本文重新爬梳文獻，考據史實，對此提出糾謬。第三，由於陳獨秀在民國時期思想和政治方面都具有開創性的影響，許多學者不免對他早期的思想和政治活動作了過高的評價。本文指出，他在晚清安徽地區是思想和行動的先驅者，但是影響是地區性的。他對國家思想、科學、民主的闡述都是很基本的知識，沒有超過梁啟超(1873-1929)等人論述的範圍。我們必須回到他的著作本身，同時把他的言論放在時代脈絡中觀察，和同時代的人相比較，才可以對他早期的思想有較為客觀的認識。第四，陳獨秀思想的重要內容，包括國家思想、進化論觀點以及從根本改造的信念，都受

⁶ 見鄭學稼，《陳獨秀傳》；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任建樹，《陳獨秀傳——從秀才到總書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沈寂，《陳獨秀傳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相關著述極多，無法一一列舉，只能以上述著作為代表。

到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的啟蒙。他從改革派轉變為革命派以後，還是抱著從根本改造的信念。他早期的思想其實是雜糅的，而且因為時局變化難測，難免陷於猶疑徬徨和矛盾。國家思想和滿漢種族思想，以及革命思想和根本改造思想往往並存在他心中，而沒有分明的界線。這是他此一時期思想極為重要的特質。本文主要就上述幾點展開討論。所謂「早期」，是指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前，和陳萬雄以 1915 年為討論的下限不同，原因是我認為陳獨秀的思想在民國以後已經發生比較大的變化，他在《甲寅》雜誌發表的文字更適合與《新青年》的文字放在一起討論。關於這點，我將在另文分析。

二、康、梁對陳獨秀政治思想的啟蒙

陳獨秀在晚清時期的文字並不多，涉及政治問題者更少，大約只有四篇文章。以往的研究對於他早期民主思想的討論，很容易過度誇大其意義，實則他在當時仍處於政治的啟蒙階段，儘管相較於當時的守舊分子，其言論有新穎之處，但是事實上不出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1866-1925)和鄭觀應(1842-1922)等新學之士論述的範圍。

陳獨秀是安徽省懷寧縣人，懷寧縣屬安慶府，因此又稱安慶人。1879 年 10 月 9 日(光緒五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出生幾個月後父親陳衍中(1848-1882)便因瘟疫死於蘇州懷寧會館。當時中國仍然實行科舉制度，政府以科舉取才，社會因而普遍崇重科舉，以進學、中舉、會進士、點狀元，求取功名，謀得官位為正常途徑。他的父親取得秀才，卻未能中舉人，母親總希望他好好讀書，中個舉人，替父親爭口氣。他幼年由叔父(即其嗣父)陳衍庶(昔凡，1851-1913)和長兄陳慶元(孟吉，1872-1909)帶讀《四書》、《五經》等，以科舉功名為目標。因此他幼年的

生活是每天熟讀經書，對外界事務一無所知。⁷他曾經明白地說：「我十年以前，在家裡讀書的時候，天天只知道吃飯睡覺。就是發奮有為，也不過是念念文章，想騙幾層功名，光耀門楣罷了。」⁸即使經過甲午戰敗的災難，仍然如在夢中，總以為清廷的災難是免不了的，他也無力改變，還不如積極地用點功，考個舉人以完成母親的心願。1896年他17歲時，以第一名通過清政府的院試，成為秀才。他的思想發生變化，是在1897年赴南京參加江南鄉試時，因為考場的經驗，讓他頓然轉為康有為、梁啟超言論的追隨者。⁹

由於陳獨秀早年的相關資料留下不多，多數的研究只能根據他寫的自傳來描述他早年的經歷。但是他的自傳只寫到參加江南鄉試，轉變為康梁派為止，以後便付諸闕如了。因此從他成為康梁派到具有革命思想、從事革命活動這段時間的經歷和思想，沒有辦法確實地把握。許多研究都認為，陳獨秀在江南鄉試落第後，次年進入著名的杭州求是書院，和沈尹默(1883-1971)是同學，學習法文、造船學等，開始接受新式教育，使他的思想起了大的變化。¹⁰這個論述的資料來源是波多野乾一(1890-1963)編的《資料集成中國共產黨史》，¹¹而該書的根據為

⁷ 陳獨秀，《實庵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頁25-35。

⁸ 三愛(陳獨秀)，〈說國家〉，《安徽俗話報》，5(蕪湖，1904.1)，頁1；亦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卷1，頁55。

⁹ 陳獨秀，《實庵自傳》，頁35-43。

¹⁰ 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35-36.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42.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頁5。

¹¹ 波多野乾一編，《資料集成中國共產黨史》(東京：時事通信社，1961)，卷1，頁32。

何卻不清楚，也沒有其他的資料可以佐證。不過，陳獨秀接觸新學，顯然還在參加江南鄉試之前，他的自傳其實明白地透露這個訊息。據他描述，他在江南鄉試時，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考場看見一位徐州的大胖子，手裡捧著試卷走來走去，搖頭晃腦，拖長著怪聲唸他的文章，唸到得意處往大腿用力一拍，叫道：「好！今科必中！」他因而聯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現象，又聯想到透過這個掄才大典舉出的人將使國家和人民如何遭殃，進而聯想到國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問題。一兩個鐘頭的冥想，使他「最後感覺到梁啟超那班人在《時務報》上說的話是有些道理呀！」這便是他「由選學妖孽轉變到康梁派之最大動機。」¹²

我們可以推斷最可能引導陳獨秀進入「冥想」的是梁啟超有關科舉的言論。梁氏在 1896 年創刊的《時務報》開始發表〈變法通議〉一文，申論變法的必要和刻不容緩，連載數期。他認為中國要自強，以開民智為第一義；要開民智便應仿照西方興辦學校；而要興辦學校，培養人才，則以改變科舉為第一義。梁氏在文中質疑科舉選才的合理正當性，指出進士舉人的名額不過數百數十人，金榜題名者難保沒有才學庸陋的人，而為數更多的落榜者中也難免有遺珠之憾。他以極能打動人心的文字進一步指出，學子以科舉功名為人生最大目標，將時間精力浪費在只注重形式的八股文寫作，使他們的才能發展受到阻礙：

試事無窮已之日，即學子無休暇之時，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而向之所謂博通古今，經營四方者，終未嘗獲一從事也。若夫瑰瑋之士，志氣不衰，衝決網羅，自成其志者，千百之中，豈無一二人哉？然其中材以下，汨沒此間而不能救者，何可勝

¹² 陳獨秀，《實庵自傳》，頁 43。

道？況此一二人者，苟非為科舉所困，而移其衝決網羅之力量，以從事於他端，則其成就，又當何如也？故學校之盛，中人亦進為上材；科舉之衰，有志亦成為無用，其差數之相去，如此其遠也。¹³

梁氏這段文字和陳獨秀《自傳》所敘述的情況相當能應和。陳獨秀看到考場的怪現狀，腦中浮現梁氏批評科舉的言論，進而觸發他深思梁氏等人其他主張確實有些道理。由此可見他在江南鄉試以前，早已經讀過《時務報》等書刊上鼓吹維新的文字，只不過這些言論在他參加江南鄉試以前還沒有對他的思想發生實際的影響。¹⁴主要的原因，是他年少時期學習成長的環境極為閉塞，不清楚外面世界的變化。他自己說在甲午(1894)年以前，完全不知道國家是什麼東西？和他有什麼關係？直到甲午年才聽說有個日本國把中國打敗。¹⁵甲午戰爭清廷戰敗以後，他開始接觸新學，不過因為他自幼浸淫在舊經書中，對於新學仍然有相當強烈的排斥感。他在 1916 年寫的〈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自述：「吾輩少時，讀八股，講舊學，每疾視士大夫習歐文談新學者，以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¹⁶直到江南鄉試考場上看到種種怪現狀，刺激了思考，才扭轉他對康、梁等鼓吹新學之士的態度。

¹³ 梁啟超，〈變法通議〉，原刊《時務報》，第 7、8 冊，收入梁啟超，《欽冰室文集》，之一(臺北：中華書局，1978)，頁 25-26。

¹⁴ 唐寶林說，陳獨秀受到 1895 年甲午戰敗的刺激和維新思想的啟蒙，在鄉試前，就已不再把個人與家庭前途放在第一位，而關注國家的命運了。(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頁 13。)以陳獨秀的自傳來檢驗，這個敘述是不正確的。

¹⁵ 三愛(陳獨秀)，〈說國家〉，《安徽俗話報》，5(蕪湖，1904.6)，頁 1；亦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卷 1，頁 55。

¹⁶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2:2(上海，1916.10)，頁 1。

這一兩個鐘頭的冥想，可以說是他對政治的覺醒和頓悟。

鄉試考場的頓悟，為陳獨秀的生命開展新的路徑。他此後放棄科舉功名，轉而積極研讀新學，汲取新知。他思想上最重要的啟蒙者便是康、梁二人。〈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明白記述康、梁對他思想的影響，說：

後讀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於域外之政教學術，粲然可觀，茅塞頓開，覺昨非而今是。吾輩今日得稍有世界知識，其源泉乃康、梁二先生之賜。是二先生維新覺世之功，吾國近代文明史所應大書特書者矣。¹⁷

康、梁的著作不但是陳獨秀學習世界知識最重要的媒介，同時對他早期的政治思想有極大的影響。康有為在甲午戰前便著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兩部書，為他的維新主張奠下思想基礎。他把春秋公羊學的三世說、托古改制和西方的進化論結合起來，提出歷史進化論的觀點。他的基本思想是：歷史的發展是變易和進化的，人類社會的演進分為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三個階段，據亂世是分崩離析的混亂時代，昇平世是《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天下為家的小康社會，太平世則是《禮記·禮運》篇所描述的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三世的進化是和平、循序漸進，不能躐等的。康有為以此歷史進化論打破前人「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以及公羊學的歷史循環論，並以之做為維新變法主張的理論基礎，認為政治的發展也應當由君主專制到君主立憲，再到民主共和。康有為對舊經書、舊學說賦予革命性的解釋，對當時的官紳士大夫思想造成極大刺激。¹⁸他的變法主張由其徒梁啟

¹⁷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頁1。

¹⁸ 參見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頁66-90；Hao Chang,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35-57.

超在《時務報》上加以發揚。梁氏把變法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密切地聯結在一起，他在〈變法通議〉一文中強調世界各國不斷求新求變，國勢因此蒸蒸日上。世界大勢所迫，中國不能故步自封，抗拒變法。他大聲疾呼：「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所以敢言矣！」¹⁹在甲午戰爭失敗後，許多人對國家瀕臨危亡感到憂心忡忡，梁氏剴切而銳利的論析，透過其富有感情的文字傳達出來，具有強大的感染力，起了振聾發聵、開啟民智的重要作用。梁啟超自己曾對《時務報》在思想和言論界造成的風潮，作了極其精當的論述：「甲午挫後，《時務報》起，一時風靡海內，數月之間銷行至萬餘分，為中國有報紙以來所未有，舉國趨之，如飲狂泉。」²⁰《時務報》於1896年8月9日創刊，陳獨秀雖然在參加江南鄉試以前就讀過梁氏的文章，但是直到參加江南鄉試，梁氏的言論才在他的腦中產生化學作用。《時務報》於1898年8月8日停刊，以後梁氏的言論發表在《清議報》和《新民叢報》上，對官紳知識分子仍持續發生影響。梁氏早期倡言變法以康有為的三世說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做為立論基礎。²¹《天演論》所強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思想，在梁氏具有魔力的文字散播下，延燒更廣。²²陳獨秀以後的文章充分流

¹⁹ 梁啟超，〈變法通議〉，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一，頁8。

²⁰ 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六(臺北：中華書局，1978)，頁52。

²¹ 赫胥黎的著作原書名為 *Evolution and Ethics* (《演化論與倫理學》)，嚴復(1854-1921)譯作《天演論》。梁啟超在1902年以後揚棄三世之說。見 Joseph R. Levenson,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87-92.

²² 赫胥黎的《天演論》最早由嚴復譯成中文，但梁啟超在傳布「優勝劣敗，

露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思想，便是淵源於此。

陳獨秀在江南鄉試「頓悟」後，轉而傾心於康、梁鼓吹的變法主張，為安慶較早擁護新學的青年。當尊古守舊之士攻擊康氏離經叛道、名教罪人時，陳獨秀還曾挺身而出為康氏辯護。他後來說當時面對守舊派群起攻康，「吾輩後生小子，憤不能平，恒於廣座為康先生辯護。鄉里耆儒，以此指吾輩為康黨，為孔教罪人，側目而遠之。」²³陳獨秀在這個時期是康有為思想的追隨者，服膺康氏的變法維新和君主立憲主張，他的國家思想和對現代政治的認識也在這個時候萌芽。他在1897年冬，也就是參加江南鄉試後，曾寫過一篇〈揚子江形勢論略〉，析論揚子江形勢的重要。這是他早年僅存的文字，是參考「舊聞旅話暨白人所論」，加上自己的見解寫成，而不是親身遊歷寫下感想。文中說：「近時敵虯臥榻，謀墮神州，俄營蒙滿，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齊，日人覬覦閩越，英據香澳，且急急欲壟斷長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轄東南七省之利權，萬一不測，則工商裹足，漕運稅餉在在艱難，上而天府之運輸，下而小民之生計，何以措之？」²⁴這篇文

適者生存」思想上所發生的影響較嚴復更大。胡適在《四十自述》說：「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天演論》出版以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志士的『口頭禪』」。又說：「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見胡適，《四十自述》（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0），頁56-57。

²³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2：4（上海，1916.12），頁1。

²⁴ 陳乾生（陳獨秀），〈揚子江形勢論略〉，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

章對於列強入侵，中國利權受到危害感到憂心忡忡，已經流露國家意識。他後來在《安徽俗話報》寫的〈說國家〉一文，則說直到庚子年(1900)英、俄等八國聯軍把中國打敗，他才知道世界分成許多國家，中國也是世界萬國中的一國；才知道一國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國家乃是全國人的大家，人人有應當盡力於這大家的大義。²⁵他在 1897 年撰寫〈揚子江形勢論略〉已經對世界各國侵略中國感到憂心，但是當時他的國家思想還有些懵懵懂懂，直到庚子事變受到進一步刺激，才體悟覆巢之下無完卵，國家興亡人人有責的道理。無論如何，他這個階段仍然處於政治思想的啟蒙時期，對於國家政治的認識止於粗淺的道理。

陳獨秀在 1897 年參加江南鄉試後的行止，由於資料不足，沒有辦法明確地掌握，只能略知梗概。他於 1898 年隨嗣父陳衍庶到中國東北，1899 年由於母親病重，與其兄匆匆回鄉，回到家門時母親已經病逝。辦完喪事後，再赴東北，大約在 1900 年底或 1901 年初再回到安慶。陳獨秀在鄉試期間結識崇尚維新的汪希顏(1873-1902)，以後和汪希顏之弟汪孟鄒(1878-1953)、李光炯(1870-1941)、鄧藝蓀(1857-1913)等維新派人士交往。²⁶他擴大了交友圈，有更多機會閱讀各種新書報，和朋友討論新知。1901 年 4 月 3 日蘇州出版的《勵學譯編》(*The Translatory Magazine*)第 1 期，陳獨秀擔任安慶的代售人，並捐助該誌銀三元。《勵學譯編》由汪郁年、戴昌煦、包公毅(天笑)等人成立的「勵學譯社」創辦。在此之前，留日學生楊廷棟、楊蔭杭、雷奮、周祖培等人於 1900

選》，卷 1，頁 12。

²⁵ 三愛(陳獨秀)，〈說國家〉，《安徽俗話報》，5(蕪湖，1904.6)，頁 1-2；亦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卷 1，頁 55。

²⁶ 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頁 9-10。

年底在日本東京創刊《譯書彙編》，以譯載日人翻譯的歐美政法名著為主，如盧騷(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的《民約論》(*Social Contract*)、孟德斯鳩(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Montesquieu, 1689-1755)的《萬法精義》(*De l'esprit des lois*, 或譯作《法意》)、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的《自由原論》(*On Liberty*, 或譯作《論自由》)、斯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的《代議政體》(*On The Proper Sphere of Government*)等書，譯筆流麗典雅，很受留學生和國內先進分子歡迎。蘇州設有日本郵便局，包天笑等人常和這些留日學生通信，並且委託他們郵寄書報。包氏等人受到留日學生的影響，也成立「勵學譯社」，倡辦《勵學譯編》，以翻譯日文書籍為主。²⁷陳獨秀擔任《勵學譯編》在安慶的代售人，顯示他和《勵學譯編》諸人有聯繫交往，他於1901年10月赴日留學，可能即得利於《勵學譯編》和《譯書彙編》諸人的協助。²⁸陳獨秀透過《勵學譯編》和《譯書彙編》等書刊，閱讀西方社會政治學名著，對西方自由、平等、天賦人權、民主思想等學說，因此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陳獨秀在「康黨」階段，除了〈揚子江形勢論略〉一文之外，並沒有留下其他的文字，他後來關於這個階段的敘述也很有限，因此只能得其梗概。他在1901年10月赴日後，雖然逐漸和革命派有更多來往，以後也參加一些革命活動，但是，我們不能完全忽視梁啟超言論對他持續的影響。梁在《清議報》時期仍然引領中國言論界的風騷，1902年2月《新民叢報》在日本創刊後，雖然繼續鼓吹君主立憲，但

27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頁147；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頁156-168。

28 鄒國義，〈陳獨秀早年事迹的新資料〉，《近代史研究》，2003：2(北京，2003.3)，頁229-235。

是常出現較為激烈的言論。尤其是他所著的《新民說》，以新民為中國第一急務，闡揚優勝劣敗的理論，分就公德、國家思想、進取冒險、權利思想、自由、自治等各個層面，論述如何鍛造、形塑新民，改造國家，對當時憂國憤世的中國青年思想起了極大的震盪。我們可以借用胡適的話來了解梁啟超帶給他們這個時代青年的影響：

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說》，……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盪感動的。他在那時代(……)主張最激烈，態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後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度了，而許多少年人衝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²⁹

胡適的這段話非常適切地反應這一時期青年思想的脈動。陳獨秀對革命有更多的熱誠，雖然和他在日本與革命派交往有極大關係，但是在思想上未嘗不是受梁啟超言論的引導。他創辦報刊雜誌，注重文字言論宣傳，從根本改造社會國家，以及他的反傳統思想，無一不受梁啟超的影響。有學者認為陳獨秀在 1898 年百日維新失敗後便了解清廷頑固派反對革新，迅速拋棄改良主義的立場，在思想上超越了康、梁。³⁰這樣的評斷並不符合歷史實情。

²⁹ 胡適，《四十自述》，頁 57-59。

³⁰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頁 34。

三、革命與愛國思想的萌發

陳獨秀在《自傳》中將他一生的政治經歷簡化為三個階段，先是「康黨」，再轉變為「亂黨」，再轉變為「共產黨」。據他自述 17 歲考取秀才時，懷寧紳士們不但另眼相看，而且還造出他家祖墳風水好等許多神話，「他們真想不到我後來做了使他們嚇破了膽的康黨、亂黨、共產黨，而不是他們所想像的舉人、進士、狀元郎。」³¹由於有這段敘述，許多學者便從他的活動去分析他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由「康黨」轉變為「亂黨」。不過，就實際情況來說，所謂由「康黨」轉為「亂黨」不必然有一個分明的界線，他對革命派的主流意見也不盡贊同。如同梁啟超曾經在立憲與革命之間擺盪，陳獨秀也經歷同樣的思想過程，有時表現傾向革命的一面，有時又有改革思想的流露。

陳獨秀從改革派轉為革命派的契機，是由 1901 年 10 月到日本留學所開啟。他先在「東京學校」（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前身）學習日語，再進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學習。他入學不久，就加入東京留學生組織的「勵志會」。該會於 1900 年成立，是中國留日學生最早創設的團體，原本是以交換智識、聯絡感情作為宗旨，但是會員在政治立場上出現激烈、穩健兩派，激烈派主張推倒清政府，建立共和政體，有楊蔭杭、雷奮等人；穩健派主張維新立憲，有章宗祥(1879-1962)、曹汝霖(1877-1966)等人。³²陳獨秀加入「勵志會」不久就感到該會逐漸變質而退出。³³不過，他在東京期間親身經歷日本政治、社會、教育等

³¹ 陳獨秀，《實庵自傳》，頁 35。

³²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 1 集，頁 146、151。

³³ 章士釗，〈疏黃帝魂〉記其事說：「庚子之後，東京有一部分老留學生，囊括曹汝霖、金邦平等在內，設有一會，顏曰『勵志』。初時論頗激昂，

各方面的進步，進一步接觸西方自由平等的學說，在學習和生活上與傾向革命的楊蔭杭等人往來密切，並得到他們的協助和照應，確實會使他的思想發生轉變。

以往學界對陳獨秀何時轉變為革命派有各種說法，有的認為是 1902 年 3 月他回安慶組織勵志學社是轉為革命派的標誌；有的認為 1902 年 9 月他第二次到日本，這年冬天加入留學生組織的革命團體青年會；有的認為 1903 年他回到安慶，在藏書樓舉行拒俄演說會，革命傾向最為明顯。1903 年安慶藏書樓拒俄演說會是陳獨秀首次公開領導的政治活動，這次演說會在後來又被視為安徽革命運動的開端，因此學者著墨較多。但是因為不容易發現新的史料，所以各方敘述大同小異。安慶藏書樓是在 1901 年創辦，截至目前為止有關這方面的研究不足，本節將對此作較詳細的考證和討論。透過這個討論一方面可以填補陳獨秀自 1901 年初到 10 月赴日的這段時間研究的空白，了解促成他赴日留學的背後因素，另一方面也解答了他 1903 年能夠在安慶藏書樓召開拒俄演說會的原因。由於後續討論和拒俄運動有密切關聯，為了利於討論，在此先對拒俄運動作簡要敘述。

1900 年，俄國趁著八國聯軍之役出兵占領中國東北。戰事結束後，俄方提出歸還東三省約款十二條，要求清廷簽約，實際上則不願撤兵，覬覦東三省路礦等權。上海維新派人士汪康年(1860-1911)、蔣智由(1865-1929)恐怕清廷在俄方逼迫下簽約，喪失利權，在 1901 年 3 月兩度舉行拒俄大會，號召各省士紳奮起，合眾人之力抵抗外力入

漸次變質，陳乾生(即陳獨秀未改之名)、張溥(即張繼未改之名)等，後參加而先脫會，即可見會之本質不妙。」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1 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 230。

侵。³⁴次年清政府與沙俄訂約，規定佔領東北的俄軍分三期撤走。1903年，俄方違約不撤，反而向清政府提出七項新要求。留日東京學生聽到消息大為激憤，發起由全體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推舉陸軍士官學生藍天蔚(1878-1922)為隊長，每天進行軍事操練，準備到東三省與俄軍開戰。³⁵汪康年等人也於1903年4月27日在張園召集拒俄大會，蔡元培(1868-1904)率領中國教育會成員和愛國學社學生參加，受到東京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的影響，也發起組織義勇隊。³⁶其後因為受到清廷干涉，東京、上海的義勇隊都改組為軍國民教育會。³⁷後來史家把1901年的拒俄行動稱為第一次拒俄運動，1903年的拒俄行動稱為第二次拒俄運動。

了解這個背景以後，我們回來談安慶藏書樓的創辦。以往有關陳獨秀的研究對於藏書樓的創辦並沒有得到一致的看法。據政協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撰寫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動〉記載，安慶藏書樓是「在省的有志青年潘晉華[應為「縉華」，也有寫作「璿華」]、葛溫仲、陳仲甫、何春臺等為了傳播新知，牖啟民智」，共同集資創設的。³⁸這段記載沒有說明資料來源。唐寶林、林

34 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3，頁20上-21上。

35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頁155-159；軍國民教育會自印，《軍國民教育會紀事》，收入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1901-190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93-95。

36 〈海上熱力史〉，《蘇報》，1903年5月6日，頁1-2；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收入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頁88-89。

37 張玉法對留日學生從成立勵志會到組織軍國民教育會的發展有詳細的討論。見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頁251-273。

38 政協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動〉，

茂生(1929-2005)編撰的《陳獨秀年譜》和唐寶林撰的《陳獨秀全傳》二書都根據這段記載來敘述。³⁹鄔國義則認為藏書樓是由安慶士紳程建勳等創設的，陳獨秀、何春臺(1868-?)與藏書樓有聯繫，但並不是藏書樓的創設者。⁴⁰中國圖書館史的研究則指出安慶藏書樓是由何熙年約集士紳創辦，但是對何熙年的背景則無所知。⁴¹事實上何熙年即何春臺，春臺是他的號。他在安慶藏書樓創辦的過程中確實扮演重要的角色。

何熙年是安慶人，1868年出生，1903年江南鄉試舉人。⁴²1901年藏書樓創辦時何熙年34歲，較陳獨秀年長11歲，和陳獨秀、潘縉華(1877-1921)等人並非同年齡的青年。有關何熙年的事蹟記載不多，比較具體的是1897年曾任張之洞(1837-1909)在湖北設立的武備學堂教習，有通判官銜。他曾把寫給張之洞的建言書投稿到《時務報》，並且寫信給該報經理汪康年、主編梁啟超等人，表達對該報和汪、梁等人言論的高度欽佩。⁴³該報把他的建言書以〈湖北何通判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為題刊出。⁴⁴後來又刊出他撰寫的〈裁

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82。

³⁹ 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頁20-21；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頁20。

⁴⁰ 鄔國義，〈陳獨秀早年事迹的新資料〉，頁230。

⁴¹ 莊華峰、劉和文，〈何熙年與皖省藏書樓〉，《國家圖書館學刊》，2006：3(北京，2006.7)，頁85；陳力，《中國古代圖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536-537。

⁴² 張杰，《清代科舉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159。

⁴³ 何熙年寫給汪康年、梁啟超等人的信，收入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第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頁3548-3549。

⁴⁴ 〈湖北何通判熙年上張香帥言武備學堂事宜書〉，《時務報》，27(上海，1897.5)，頁7上-10下；31(上海，1897.6)，頁7下-11下。

兵私議》。⁴⁵由信函和他的議論可以看出他的思想頗傾向維新，屬於安慶的開明士紳。因為他和汪康年有這層淵源，而且對兵事向來極為關注，因此當汪康年於 1901 年 3 月 24 日在上海張園召集抗拒俄約大會，何熙年曾前往參加，並且上臺發表演說。⁴⁶

何熙年是在 1900 年末義和團事變後辭官從湖北回到安慶，次年 3 月到上海參加抗拒俄約大會，返回安慶以後就積極籌設安慶藏書樓。這是中國第一座公共圖書館。1901 年 5 月 16、17 日《中外日報》和《同文滬報》刊出〈創辦皖省藏書樓官紳第一期捐款〉公啟，就是由何熙年執筆。這份公啟對了解安慶藏書樓的創辦以及陳獨秀早期的交往和活動提供了重要的線索。公啟說明創辦藏書樓的緣起，是在義和團事變以後，安慶知府方坤五(連軫)和前懷寧縣令姚石荃(錫光，1857-1921)⁴⁷認為拳亂引起地方不安、謠言紛傳，原因在於安慶思想閉塞、風氣未開，而地方人才雖多，卻擅長誦讀經文，而不講求經世之學，因此倡議創辦藏書樓，購買圖書，供大眾學習，以開通風氣。何熙年自始便參與規劃。但是因為守舊之士反對阻撓，半途而廢。何熙年從上海參加拒俄大會回安慶後，因為受到俄約事刺激，更感到設立藏書樓開展新機的迫切，於是積極奔走籌劃。從公啟所述「乃自開辦至今，甫及旬日」，「料現已收齊捐款，略具規模」，可見藏書樓是從 1901 年 5 月初開始集資開辦。捐款明細顯示，安徽巡撫王之春(1842-1906)、安慶知府方坤五、前懷寧縣令姚石荃等官員各捐助銀二百兩至一千

⁴⁵ 何熙年，〈裁兵私議〉，《時務報》，54(上海，1898.3)，頁 1 上-5 下。

⁴⁶ 〈紀第二次紳商集議拒俄約事〉，《中外日報》，1901 年 3 月 25 日，第 2-3 版。報上記載何春臺登臺演說。另記載同臺演說的還有「安徽某君」，究竟是誰，無法得知，其他資料也沒有相關的記載。

⁴⁷ 姚石荃於 1900 年 6 月 21 日任懷寧縣令，1901 年 3 月 16 日調署和州直隸州知州，兼充下遊皖軍營務處總辦。舒習龍，〈姚錫光生平及其成就初探〉，《長江論壇》，2007：1(武漢，2007.1)，頁 75。

兩，占藏書樓經費的最大宗，另外由懷寧(即安慶)、桐城等地士紳各捐洋十元至一百元集資建成，因此是「官助紳成」性質。捐款的士紳，包括何熙年、潘世琛、程建勳等人各捐洋一百元。按照規章捐款百元以上的人可以擔任藏書樓理事。⁴⁸潘世琛就是潘縉華，桐城人，是潘贊化(潘瓊華，1885-1959)的堂兄。潘贊化自幼父母雙亡，由伯母即潘縉華的繼母撫養。捐款名單中有「桐城潘太宜人捐洋一百元」，何熙年在公啟中特別提到：「甚至若桐城潘太宜人者，聞風景慕，亦特捐百元以贊成之。」桐城潘太宜人就是潘縉華繼母的可能性極大。捐款名單又有「懷寧葛布衣襄捐洋十二元」，葛襄即葛溫仲(1881-1914)。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捐款名單中有「懷寧陳別駕健生捐洋一百元」。與陳獨秀感情至深，被他稱為「阿彌陀佛的大哥」陳慶元，字孟吉，官名健生，府學廩貢生，瀋陽候補同知。清代有將候補同知尊稱為別駕，當時懷寧府學廩貢生、候補同知身分的只有陳孟吉一人，「懷寧陳別駕健生」可以確定就是陳獨秀的大哥陳孟吉。陳孟吉當時不在安慶，由陳獨秀以其名義代捐。〈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動〉一文記載陳獨秀共同創設藏書樓由此可以得到印證。上文提到 1901 年 4 月蘇州出版的《勵學譯編》第 1 期，陳獨秀擔任安慶的代售人，並捐助該誌銀三元。而根據鄔國義研究，1901 年 5 月 3 日出版的《勵學譯編》第 2 期由何春臺(熙年)接替陳獨秀代售。⁴⁹這個時間正是何熙年集款創辦藏書樓之時，由此可知兩人因為創辦藏書樓和購置圖書事宜已有密切的聯繫。藏書樓的創辦，讓何熙年、陳獨秀、潘縉華、潘贊化、葛溫仲等安慶崇尚新學的士紳和青年有了進一步結合，擴大陳獨秀的交

48 〈創辦皖省藏書樓官紳第一期捐款〉，《同文滬報》，1901 年 5 月 16 日，第 3-4 版；〈創辦皖省藏書樓官紳第一期捐款〉，《中外日報》，1901 年 5 月 16、17 日，廣告版。

49 鄔國義，〈陳獨秀早年事迹的新資料〉，頁 227-230。

友圈。陳獨秀由此建立的人際網絡，對他前往日本學習是重要的助力。他在 1901 年 10 月首次赴日，次年 3 月回國，在安慶成立勵志學社，這些思想趨新的士紳青年更常聚在一起研讀介紹新思想的圖書，交換心得。1902 年 9 月，勵志學社被官方解散，陳獨秀和葛溫仲、潘縉華、潘贊化三人一起赴日學習。⁵⁰

關於陳獨秀 1902 年 3 月回到安慶，到這年 9 月再赴日本這段期間的活動，由於相關史料的記述在時間上有些混淆，因此造成後來的研究跟著發生許多錯誤。為免以訛傳訛，有必要在此加以釐清。這些研究主要根據的史料是收錄在《辛亥革命安徽資料匯編》的〈安慶藏書樓革命演說會〉一文，該書註記為安徽省博物館所藏未刊稿，作者不詳。據該文所述，陳獨秀和何春臺、葛溫仲等人於光緒二十八年(1902 年)發起藏書樓演說會，復於張伯寅家組織青年勵志學社，每週聚會，各出所得錄為筆記，並且舉行兵式操，由張伯寅之弟仲寅以英語呼喊口令。安徽高等學堂學生柏文蔚(1876-1947)、鄭贊丞(1877-1914)都加入，因為參加演說而被開除，後轉入武備練軍學堂。該文指出：「江督端方急電皖統領韓大武，告以皖省之勵志學社與東京抗俄義勇隊互通聲息，名為抗俄，實則排滿，且密布黨羽，希圖大舉，務將何春臺、陳仲甫、潘世琛、潘贊化等一體緝獲，無任逃遁。」⁵¹後來許多學者，如任建樹、唐寶林等人都根據這條史料來論述陳獨秀 1902 年間在安慶的活動，以此作為他轉為革命派的標誌。⁵²但是，這條史料在時間

50 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頁 19 所記潘世壁(瓚華)，即潘贊化，「世壁」為「世璧」之誤；頁 40 陳乾生即陳獨秀；頁 44 潘世璜(璜平)，即為潘瓚華，誤作「璜平」，是潘縉華之弟；頁 44 也記有葛襄(溫仲)。

51 闕名，〈安慶藏書樓革命演說會〉(安徽省博物館藏未刊稿)，收入張湘炳等編，《辛亥革命安徽資料匯編》(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 166。

52 任建樹，《陳獨秀傳》，頁 45；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頁 18。

上發生明顯的錯置，主要有三：第一，東京留學生是在 1903 年組織拒俄義勇隊，上海愛國學社是最早響應東京留學生組織義勇隊(後改為軍國民教育會)的團體，如果陳獨秀等人真的有兵式操的操練，也是仿效義勇隊練兵式操，不可能發生在 1902 年。第二，1902 年 9 月以前兩江總督是劉坤一(1830-1902)而不是端方(1861-1911)，端方其時代理湖廣總督，直到 1904 年才代任兩江總督。東京留學生組織拒俄義勇隊時，清駐日公使蔡鈞致電端方，說留學生組織義勇隊「名為拒俄，實則革命」，端方隨即電告各督撫嚴拿各地響應者。⁵³此事發生在 1903 年，當時端方的身分是湖廣總督。第三，陳獨秀在藏書樓演說會成立「與東京抗俄義勇隊互通聲息」的團體是安徽愛國會，不是勵志學社。後來的研究者未能細察這些史料存在嚴重錯誤，以致於受到誤導。此外，多數學者都說陳獨秀在 1902 年組織青年勵志社的同時，還準備創辦《愛國新報》，他們根據的史料是天津《大公報》1902 年 4 月 19 日的報導。最早提出這個說法的似乎是陳萬雄，以後的研究輾轉承襲。⁵⁴這又是把史料的時間弄錯了。經查該報有關《愛國新報》的報導是在 1903 年 4 月 9 日，事實上《愛國新報》是陳獨秀在 1903 年成立安徽愛國會計劃刊行的。(詳下文)所以，關於陳獨秀這段期間在安慶的活動，以往的記述是明顯錯誤的。比較可信的是，他和葛溫仲、潘縉華等好友，仿照東京的勵志會，在安慶成立了青年勵志社，研讀介紹新思想的書刊，定期聚會，議論維新的辦法。他們的活動被官方

⁵³ 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1901-1905》，頁 276-279。

⁵⁴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頁 32、52；鄭學稼，《陳獨秀傳》，上冊，頁 81-82；任建樹，《陳獨秀傳》，頁 45；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頁 18；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安慶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辛亥革命在安徽》(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頁 32。

禁阻，青年勵志社被解散，陳獨秀等人被迫離開安慶，再赴日本求學。他和葛溫仲等人途經南京，拜訪汪希顏，認識了汪在南京陸師學堂的同學章士釗(1881-1973)。章士釗日後說：「陳獨秀者，……愚因皖中賢士汪鑄希顏、葛襄溫仲識之。」⁵⁵他們的結交即在此時。

東京勵志會不是革命團體，仿照它成立的安慶勵志學社自然也不能視為革命團體，所以把陳獨秀組織勵志學社視為他轉變為革命派的標誌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陳獨秀於 1902 年 9 月第二次到東京，進入成城學校陸軍科學習，與更多革命派人士交往。1902 年冬，東京留學生葉瀾、董鴻禕(1878-1916)、汪榮寶(1878-1933)、秦毓鎰(1880-1937)、張繼(1882-1947)、馮自由(1882-1958)等人發起組織青年會，明白揭示以民族主義為宗旨，以破壞主義為目的，是日本留學界最早成立的革命團體，陳獨秀和蔣百里(1882-1938)、蘇曼殊(1884-1918)、潘贊化等二十餘人加入，在該會成立那天留下合影照片。⁵⁶這是轉向革命派較為明顯的事證。到了次年 3 月 31 日，他和張繼、鄒容(1885-1905)等人，因為對清廷派的湖北留學生監督姚煜(文甫)的言行不滿，由張繼抱腰，鄒容捧頭，陳獨秀揮剪剪去姚的辮髮。⁵⁷由於清駐日公使蔡鈞對日本政府提出強力交涉，陳獨秀和張繼、鄒容等人因而被遣送回國。陳獨秀沒有留下這個時期的相關文字和言論，我們只能從他和革命派的交往窺知他在思想上已由康梁派轉為革命派，而無法詳細了解其意涵。

1903 年東京和上海展開拒俄運動時，正是陳獨秀被遣送回國前後。唐寶林根據潘贊化的回憶說，陳獨秀回國先到上海和蔡元培、吳

55 孤桐(章士釗)，〈吳敬恆、梁啟超、陳獨秀〉，《甲寅周刊》，1：30(北京，1926.2)，頁 5。

56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 1 集，頁 151-154。

57 章士釗，〈疏黃帝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1 集，頁 229。

敬恆(稚暉, 1865-1953)、章炳麟(太炎, 1869-1936)、鄒容一起主持愛國學社, 參加上海的運動。⁵⁸陳獨秀有沒有參加上海的拒俄大會, 目前還沒有其他的資料可以佐證。吳稚暉 1903 年 4 月 10 日(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的日記記有:「陳乾生, 重輔, 安徽人。」其後案語說:「陳重輔大約即陳仲甫。」⁵⁹吳稚暉何以有此記載, 原因不明, 不過可見他對陳獨秀並不熟悉。而他 4 月 16 日(陰曆三月十九日)的日記記載張繼和鄒容從東京來, 並沒有提到陳獨秀。⁶⁰因此陳獨秀是否曾參加上海的大會有待進一步查證。而至於潘贊化說陳獨秀和蔡元培等人一起主持愛國學社, 恐怕是記憶錯誤。可以確定的是, 陳獨秀一回到安慶, 就響應東京、上海的拒俄行動。他和潘縉華、葛溫仲共同發起, 於 5 月 17 日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演說會, 鼓吹拒俄, 當天參加的有高等學堂、武備學堂、桐懷公學校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共二百多人。他們三人都是藏書樓的發起人和理事, 而藏書樓的主要創辦人何熙年既然曾經在 1901 年 3 月間前往上海張園參加拒俄大會, 並且登臺演說, 對於陳獨秀等人的拒俄演說會自然大力支持。這是拒俄演說會會在藏書樓舉辦的原因。陳獨秀等人當場成立安徽愛國會, 分設演說、體操兩會。前面提到兵式操的操練是愛國會策劃進行, 《愛國新報》則是愛國會準備籌辦的刊物。⁶¹

58 唐寶林, 《陳獨秀全傳》, 頁 18。

59 吳稚暉, 〈自蘇報案至赴歐日記〉, 收入羅家倫、黃季陸主編, 《吳稚暉先生全集》(臺北: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委員會, 1969), 卷 12, 1903 年 4 月 10 日(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三日), 頁 696。

60 吳稚暉, 〈自蘇報案至赴歐日記〉, 收入羅家倫、黃季陸主編, 《吳稚暉先生全集》, 卷 12, 1903 年 4 月 16 日(光緒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頁 698。

61 〈安徽愛國會之成就〉, 《蘇報》, 1903 年 5 月 25 日, 頁 1-2。唐寶林、林茂生編, 《陳獨秀年譜》記載 1903 年 4 月中, 陳獨秀和潘縉華、潘璇華(潘縉華弟)等籌組「安徽愛國會」(頁 23)。愛國會確實在 5 月 17 日演說

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拒俄演說會，表現相當強烈的愛國思想。他之所以積極展開這個行動，一方面是呼應東京青年會及上海愛國學社的行動，另一方面則和他個人的經驗有密切的關係。1900年，俄國出兵占領中國東北時，他隨嗣父居住在東北，曾親眼看見俄人如何欺凌中國人。他在演說中述說親身經歷：

俄人虐待我中國人已非一日。僕游東三省時，曾目睹此情形。中國人坐火車者，雖已買票，常於黑夜風雨中無故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於車中，華官不敢過問。沿鐵道居民時被淫虐者更言不勝言。前年金州有俄奸淫婦女而且殺之，地方老紳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論，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將二百人全行擊斃。俄官設驗疫所於牛莊，納多金者則免，否則雖無病者亦置黑獄中，非納賄不放。其無錢而囚死獄中者，時有所聞。⁶²

他親眼看見俄人欺凌中國人的行徑，印象極為深刻，心理上也受到極大刺激。我們前文曾經提到他在庚子事變以後對國家思想有進一層體悟，便和這段經驗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現在俄國提出無理要求想侵占中國利權，他自然極為激憤，積極發動抗拒俄約運動。他發出通啟號召大眾參加演說會，大聲疾呼各國瓜分中國在即，大家應當奮起救國：

會召開之前已經籌組，此由召開演說會的知啟具名「皖城愛國會同仁」可以得知。不過潘璇華在5月17日的演說：「今晨由滬歸皖，適諸君開演說於書樓。」（〈安徽愛國會演說〉，《蘇報》，1903年5月28日，頁2）（案：《蘇報》記其名為潘旋華）可見潘璇華並未參與愛國會最初發起事宜，而是後來加入。另外，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把《愛國新報》列為出版的報紙。（頁147）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根據上書列入出版。（頁90）但是演說會舉行三天以後就受到官方禁阻，《愛國新報》是否曾經出版頗值得懷疑。

⁶² 〈安徽愛國會演說〉，《蘇報》，1903年5月26日，頁2。

嗚呼！事迫矣！勢亟矣！若我國人心稍懦，俄約一經許允，則東西各國執利益均霑之說，并起而圖，德索山東，法占兩粵，日據閩浙，英取長江，我最敬愛最有為的大中國，豈不胥淪為異域，而尚有尺寸乾淨土哉？我神州血性男子，須知國與人民利害相共，食毛踐土，具有天良，時至今日，若仍袖手旁觀，聽天待斃，則性命身家，演己身目前之慘，奴隸牛馬，貽子孫萬代之羞。神州大陸，忍令坐沈，家國興亡，在此一舉。⁶³

他在演說中反覆申說人民和國家有休戚與共的關係。這些言論流露強烈的救亡圖存意識，是傳統士大夫憂患意識的發抒，以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以天下為己任」思想的呈現。⁶⁴

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此時特別強調國家和群體較個人自由重要，他在演說中提醒：「國事不支，豈政府獨受其累，各人身家又焉能保全？」呼籲大眾「除平日為己之私見，當守合群愛國之目的」。⁶⁵這個想法在他所擬的安徽愛國會(初名愛國社)章程中表達得更為清楚，其宗旨明揭：「本社因外患日亟，結合士群為一團體，發愛國之思想，振尚武之精神，使人人能執干戈、衛社稷，以為恢復國權基礎。」而章程中訂有「戒約」，其中一條為：「戒主張各人自由，放棄國家公

⁶³ 〈安徽愛國會之成就〉，《蘇報》，1903年5月25日，頁1-2。

⁶⁴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觀念，源自明末清初大儒顧炎武(1613-1682)《日知錄》，原文為：「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炎武，《日知錄》，卷13，〈正始〉，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整理，《顧炎武全集》，第18冊(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527。

⁶⁵ 〈安徽愛國會演說〉，《蘇報》，1903年5月26日，頁2。

益。」⁶⁶他此時強調國家思想、愛國心的重要，和他在《甲寅》質疑愛國心、《新青年》主張個人自由是不同的。

陳獨秀在藏書樓召開的拒俄集會，也有發展革命的意圖。他在發起愛國會時曾經公開宣布：「如辦有基礎，擬與上海愛國學社通成一氣，並連絡東南各省志士，創一國民同盟會，庶南方可望獨立，不受異族之侵凌。」⁶⁷他所說的南方「獨立」，有效法八國聯軍之役東南互保的意味；創立「國民同盟會」，則是呼應上海拒俄運動組織中國國民總會的倡議，以及北京學生發起組織中國學生同盟會。⁶⁸而「不受異族之侵凌」的「異族」，雖然明白指的是俄人，但或許也隱喻滿人，帶有鼓吹革命的用意。當時《蘇報》上有一段報導說：「本月二十一日(案：即1903年5月17日)，有一游學日本陸軍隊退回之學生陳某，在拐角頭之藏書樓開演說會，邀集各學堂學生聽講，其宗旨略言，學堂諸科，均屬無用，應請停課，專習體操，以攻打俄人。我現接京師大學堂學生來信，要連合三江各學堂為一大團體，並雜以革命流血諸說，痛詆官場及教習。」⁶⁹這裡所說的「陳某」就是陳獨秀。汪康年後來曾簡短述及此事，印證了《蘇報》的記載：「前十年皖人因拒俄會演說，而中間忽驛入革命話頭，謂應先殺一城之官吏。」⁷⁰由此可見陳獨秀在安慶召集的拒俄會，和東京、上海、北京等地一樣，都藉機散播革命思想，這正是清廷以「名為拒俄，實則革命」做理由，嚴

66 〈安徽愛國社擬章〉，《蘇報》，1903年6月7日，頁3。案：該報將「國家公益」誤排為「國家公蓋」。

67 〈安徽愛國會之成就〉，《蘇報》，1903年5月25日，頁1-2。

68 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1901-1905》，頁69-70；〈論中國學生同盟會之發起〉，《蘇報》，1903年5月30、31日，頁1。

69 〈安徽省城大學堂第一次衝突的原因〉，《蘇報》，1903年5月26日，頁2-3。

70 汪康年，《汪穰卿筆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卷4，頁16。

加禁阻的原因。⁷¹

以上對 1901 年到 1903 年陳獨秀的思想和活動做了些還原的工作。這段期間陳獨秀參與創辦藏書樓，結交有志的趨新之士，遠赴日本留學，積極吸收新知，他的思想發生比較大的變化。尤其是 1902-1903 年間，中國國內和留日學生界革命思想逐漸蓬勃，陳獨秀受到激盪也傾向革命。他在安慶藏書樓召開拒俄演說會，和上海張園的拒俄大會相呼應，在強烈的愛國心趨使下，對清廷腐敗無能不滿，革命思想愈來愈強。1903 年 8 月，也就是在藏書樓演說會三個月以後，他曾有詩作〈題西鄉南洲游獵圖〉發表在《國民日日報》上，詩文是：

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鳴。直尺不遺身後恨，枉尋徒
屈自由身。馳驅甘入棘荊地，顧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
劍，不知事敗與功成。⁷²

西鄉南洲即西鄉隆盛(1828-1877)，是日本江戶時代末期的薩摩藩武士，也是推動明治維新的重要人物。1873 年辭官回到鹿兒島，設立炮術學校和槍術學校，致力於培養青年。當時日本發生多起土族叛亂，政府恐怕西鄉隆盛叛亂，密令將鹿兒島內陸軍火藥庫中的武器彈藥全部運走。西鄉隆盛的學生們對政府的猜忌舉動極為氣憤，於是開始襲擊陸軍火藥庫。西鄉隆盛當時正在大隈半島狩獵，聽到消息十分驚訝，但是學生們既然已經採取行動，不願束手就擒，於是起兵反叛。西鄉隆盛不敵政府軍，數月以後兵敗而死。陳獨秀寫這首詩是對西鄉隆盛的精神有感而發，也可以反映他這個時候的革命情懷。

⁷¹ 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1901-1905》，頁 278。

⁷² 由己(陳獨秀)，〈題西鄉南洲游獵圖〉，《國民日日報》，1903 年 8 月 17 日；亦收入羅家倫主編，《國民日日報彙編》，第 1 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文苑」，頁 16-17。

四、從根本改造的信念與革命派分歧

陳獨秀在安慶藏書樓拒俄演說會發表有關革命的言論，並且成立愛國會，打算操演兵操，出版《愛國新報》，每個禮拜舉行演說，引起官方注意。安慶知府桂英親自前往藏書樓宣諭禁止演說和私立社會，查拿發起諸人，陳獨秀因而逃往上海。⁷³陳獨秀到上海後，和章士釗、謝小石創辦《國民日日報》，並和章士釗、張繼等人擔任主編。《國民日日報》是《蘇報》被查封後中國國內最重要的革命日報，因為遭到清廷示禁，經費又短缺，四個月後停刊。1904年3月他回安徽蕪湖創辦《安徽俗話報》。辦報的同時也任教於安徽公學，還曾參加暗殺團，並且和柏文蔚等人發起組織岳王會，進行反滿革命。關於他參加暗殺團、組織岳王會等事，過去已有不少研究，本文無需再贅述。⁷⁴以下想要就《安徽俗話報》和陳獨秀的著述進行討論。由於有些學者認為陳獨秀後來沒有參加同盟會，是因為他把眼光放在國家，而不注重滿漢之分，本文也將就此提出商榷。因為這兩者對於客觀認識陳獨秀晚清時期的思想是極為重要的。

陳獨秀早年留下的文字以發表在《安徽俗話報》上最多，這些文字自然成為了解他早期思想的主要文獻。《安徽俗話報》是白話報，陳獨秀和胡適在《新青年》提倡文學革命，被視為白話文的先驅，《安徽俗話報》因此受到重視，從其中也可以尋繹陳獨秀早期的民主思想、

⁷³ 鄧玉汝，《陳獨秀年譜》（香港：龍門書店，1974），頁9。關於藏書樓演說會被查禁一事，天津《大公報》有詳盡的記載，見〈記藏書樓演說〉、〈禁止演說〉，天津《大公報》，1903年6月5日，第2版；6月12日，第3版。

⁷⁴ 參見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頁34-80；鄭學稼，《陳獨秀傳》，上冊，頁60-102。

對科學的重視、對社會習俗的批判等思想。前人已有不少討論，本文想從幾個不同的面向進一步觀察。

第一，放在當時的歷史脈絡來看，《安徽俗話報》是清末開民智運動或民眾啟蒙運動下的產物。清末開民智運動的興起，有它的時代背景。甲午戰爭失敗以後，中國思想較先進的知識分子康有為、嚴復等人就已提出開民智的重要。康氏在〈上清帝第二書〉強調泰西富強，是由於人民讀書識字普遍，民智大開，主張中國欲求富強，必須要在鄉村各地廣設學塾，使人人可以入學，以培植人才，厚植國力。嚴復也強調，要挽救中國面臨的危機，除了要在提升國防軍事力量等治標的策略上努力之外，還要講求治本之道。而所謂治本之道，就是要在民智、民力、民德三方面努力。他正式提出「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三個鮮明的口號。在他們的倡導之下，新式報紙、學堂和學會大量出現。根據陳萬雄的研究，上海在 1876 年就有「專為民間所設，故字句俱如尋常講話」的《民報》。到了 1897 年以後才有較多的白話報出現。我們如果仔細留意晚清白話報創辦的時間，將發現和清廷在外交遭到挫敗，民族危機感加深息息相關。大抵可以分為三波，1897 年到 1900 年有《俗話報》、《蒙學報》、《演義白話報》、《無錫白話報》等五種。《無錫白話報》創辦的主旨是要使商人、農人、工人和童塾子弟有能力購買報紙的人「略能通知中外古今及西政、西學之足以利天下，為廣開民之助」。⁷⁵這是受甲午戰敗的刺激，興起辦白話報的第一波熱潮。到了義和團事變發生，清廷遭到八國聯軍重挫，國家面臨嚴重危機，一些知識分子又再強調「開民智」的重要，紛紛開辦白話報、創立閱報社、宣講所、演說會等，展開民眾啟蒙運

⁷⁵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頁 38。

動。⁷⁶1901年6月，《杭州白話報》創辦於杭州，以開民智、作民氣為宗旨。⁷⁷同年8月，《京話報》創刊於北京，其宗旨「專為開民智消隱患起見」，指出：「中國所以不能自強，受人欺負的緣故，不過兩端，一是民智不開，一是人心不齊。」⁷⁸兩者揭示的宗旨相同，都注重啟迪民智，養成國家觀念以及維新進步的思想。這是清末創辦白話報的第二波。到了1903年11月，上海《中國白話報》、寧波《寧波白話報》相繼創辦，《紹興白話報》、《潮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等白話報刊接踵繼起，蔚然成風，是第三波，為清末白話報的高潮期。這次白話報風潮的興起，主要是受到俄國侵占東三省事件的刺激，以及拒俄運動的影響。它們和1901年《杭州白話報》以及《京話報》一樣，都是在救亡圖存的心理下發展出來的。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是順應這股風潮，同時也受到這些白話報的影響。它一方面反映陳獨秀認同「開民智」的重要，並且落實為具體行動；另一方面，這些白話報的創辦其實是拒俄運動的餘緒，陳獨秀創辦《安徽俗話報》也是他領導安慶拒俄運動的延續。這兩波白話報風潮以及陳獨秀的辦報經歷，是民初白話文運動的前導。

第二，由於這些白話報是拒俄運動的餘緒，因此它們都特別著重俄事消息的報導和評述。它們以淺白的文字警告民眾，東三省一旦被俄國占領，中國將遭到被瓜分的命運，鼓吹每個人都要關心國事，發揮愛國心，挽救國家於危亡。陳獨秀的《安徽俗話報》也是運用類似

76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11-14。

77 雄次郎，〈本報一年期滿總論〉，《杭州白話報》，第33期，1902年6月1日，頁4。

78 〈創辦京話報章程〉、〈論看這京話報的好處〉，《京話報》，第1回，1901年8月15日，「章程」欄，頁1；「論說」欄，頁3。

的話語，傳達同樣的觀念。他撰寫的〈說國家〉一文，介紹西方「國家學」的基本知識，指出國家是由土地、人民、主權三個要素所構成。土地為建立國家的第一要件，尺土寸地，都不可輕易讓人。其次，國家由人民所建立，一個民族當建立一個國家，不受其他民族轄治，此即西方盛行的「民族國家主義」。第三，國家要有主權。主權原是全國民眾所共有，但應由代表國民的政府行使主權，不但國中之人不能侵犯主權，外國也不能干預侵奪。他同時指出，國家的盛衰榮辱，全國的人都是一樣消受，所以每個人對國家都有應當盡力的大義。國家大事，不能靠著皇帝一人胡為，或者倚仗外人保護，如果大家都不關心國事，國家必然滅亡。⁷⁹〈亡國篇〉的意旨和〈說國家〉大致相同。它的重點是在述說中國的土地、利權、主權三樣被外國占奪的現象，痛言中國已經滅亡，同時分析中國亡國的原因，一是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國；二是只知道聽天由命，不知道盡人力。⁸⁰其他還有〈瓜分中國〉、〈論安徽的礦物〉、〈安徽的煤礦〉幾篇，也是討論主權和利權的問題。這些文字主要的目的，是要讓一般民眾認識國家、主權、利權的重要，提醒民眾國事與一身一家息息相關，激發民眾的愛國心。

值得注意的是，陳獨秀雖然抱持民主共和的理想，這些文字卻沒有進一步討論人民參政的權利和政體的問題。《安徽俗話報》共出版22期，他所寫的文章，只有在〈地理略〉第一篇「世界大略」提到：「全地球上，大小幾十國，治國的法子，各樣不同，計分三樣政體：一是民主政體，由百姓選舉議員和大統領，管理國事；一是君民共主，由百姓選舉議員和君主，共理國事；一是君主專制，由君主一人專理

⁷⁹ 三愛(陳獨秀)，〈說國家〉，《安徽俗話報》，5(蕪湖，1904.6)，頁1-4；亦收入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卷1，頁55。

⁸⁰ 〈亡國篇〉分刊在《安徽俗話報》，第8、9、10、13、15、17、19期，1904年7月始刊，到1905年6月刊完全文。

國事，和百姓毫不相干。」⁸¹僅止寥寥一百字左右，沒有再加申論。《安徽俗話報》討論國民權利義務的文章只有署名「中國人」所寫的〈奉勸大家要曉得國民的權利和義務〉一文。⁸²陳獨秀何以未撰文向民眾介紹民主的基本理念呢？原因令人費解。他在發刊詞〈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說：「我這種俗話報的主義，是很淺近的，很和平的，大家不要疑心我有什麼奇怪嚇人的議論。」他說明辦這個報有兩個主義，一是把各地發生的事情說給安徽人聽，二是把各種淺近的學問，用通行的俗語說出來，教安徽人長點見識。⁸³或許他不願涉及被認為與革命相關的問題，以避免引起官府的干預。如果拿來和林獬(白水，筆名白話道人)的《中國白話報》比較，《安徽俗話報》在民主民權思想的介紹方面顯得保守許多。當然，上海和安徽在政治和思想的開放程度上有所差別，可能影響兩者的言論尺度。

第三，這些白話報都把改良社會看做強國的途徑，都對社會的壞風俗痛加批判，反對迷信鬼神，宣傳各種科學知識，利用小說宣傳政治主張、重視教育等。⁸⁴陳獨秀的《安徽俗話報》也受到它們的影響。他寫的〈惡俗篇〉，指出這些壞風俗關係國家強弱，有改去的必要。他提出的第一項惡俗，就是婚姻。他認為「夫婦乃人倫之首，為人間第一件要緊的勾當」，偏偏中國人對於婚姻諸多不合情理：其一，婚姻由父兄作主，不是出於兩情相悅；其二，成婚時聘禮、穿著、坐轎、鬧新人等種種規矩，讓婚姻成為爭吵、傷心、受罪的事情；其三，成

81 三愛(陳獨秀)，〈地理略〉，《安徽俗話報》，3(蕪湖，1904.5)，頁18。

82 中國人，〈奉勸大家要曉得國民的權利和義務〉，《安徽俗話報》，第21、22期合本(蕪湖，1905.8)，頁14-15。

83 三愛(陳獨秀)，〈開辦安徽俗話報的緣故〉，《安徽俗話報》，1(蕪湖，1904.8)，頁1-4。

84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頁34。

婚後不能退婚。這些壞習俗都需要改掉。他也批評燒香敬菩薩是白費銀錢、迷信的壞習俗，說：「菩薩是斷斷敬不得的了，不如將那燒香打醮做會做齋的錢，多辦些學堂，教育出人才來整頓國家，或是辦些開墾、公益、礦務諸樣有益於國，有利於己的事，都比敬菩薩有效驗多了。」⁸⁵陳獨秀對「惡俗」的批評，是他在《新青年》攻擊傳統的先導。

陳獨秀的言論和《安徽俗話報》的意義，要放在上述歷史脈絡來看，才可以有比較真切的了解。他投注相當大的心力在《安徽俗話報》上，1922年4月他為蕪湖科學圖書社廿週紀念寫了一段話對此做了最翔實鮮活的描述，他說：「我那時也是二十幾歲的少年，為革新感情所趨使，寄居在科學圖書社樓上，做《安徽俗話報》，日夜夢想革新大業，何物臭蟲，雖布滿吾衣被，亦不自覺。」⁸⁶他說的「革新」，不只是革命行動，同時要從宣傳和教育進行思想的根本改造。由此可以延伸討論他何以後來和革命黨人立異的問題。

陳獨秀和革命派主流未能合拍，是否緣於對滿漢種族問題存有歧見呢？任建樹、唐寶林都認為他此時著眼於帝國主義和中國各族人民之間的矛盾，而不強調滿漢之間的矛盾，因為他認為滿清皇帝也是中國人，換朝不等於亡國，這個看法較章太炎等人站在大漢族的立場，強調滿漢之間的仇恨更為高明，是「深刻而富有遠見的觀察」，也是他始終不加入同盟會的重要原因。他們最主要的根據，是陳獨秀在《安徽俗話報》所寫〈亡國篇〉的一段話。⁸⁷我們且先把陳獨秀這段話的原文引述如下：

⁸⁵ 三愛(陳獨秀)，〈惡俗篇——敬菩薩〉，《安徽俗話報》，7(蕪湖，1904.7)，頁6。

⁸⁶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頁200。

⁸⁷ 任建樹，《陳獨秀傳》，頁72-74；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頁32-33。

「亡國」這兩個字怎樣解說？我們中國人懂得透的很少。先要懂得「國」字怎樣解說，那自然就明白亡國是怎樣解說了。這國原來是一國人所公有的國，並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國，皇帝也是這國裡的一個人。這國裡無論是那個做皇帝，只要是本國的人，於國並無損壞。我們中國人，不懂得國家和朝廷的分別，歷代換了一姓做皇帝，就稱做亡國，殊不知一國裡，換了一姓做皇帝，這國還是國，並未亡了，這只可稱做「換朝」，不可稱做「亡國」。必定這國讓外國人做了皇帝，或土地主權被外國占去，這才算是「亡國」。⁸⁸

這段話主要是說朝代換了，只是換了皇帝，並不就是國家亡了。〈亡國篇〉分成好幾期刊登、前後歷經十個多月才刊完，前文已經介紹它的要旨，而這段話其實只是文章的開場白而已，全文並沒有就滿漢、換朝、亡國之間有何等關係再做進一步討論。這裡所說「皇帝也是這國裡的一個人」，是不是表示他沒有反滿的思想呢？1927年2月陳獨秀在《嚮導週報》上寫了一篇短文，對上面這段話做了註解，這篇短文寫道：

從前有一個日本留學生，不知從那裡拾得了「國家和朝廷有別」這句話，譏誚革命黨人無知識，不懂得國家和朝廷之分，因為革命黨人說明朝亡了就是亡國。在這個留學生的意思，以為滿洲入主中國，只是亡朝，並非亡國，大概必需把中國這塊土地的人民沈到大海中才算是亡國。現在國家主義者也譏誚我們「看不出國家和政府之分」，他們以為中華民國這塊招牌被北洋軍閥負之而趨，「這是政治上的問題，並不是國家本身的問題」。不錯，即使將來外國人完全管理了中國政府，也不過是

⁸⁸ 三愛(陳獨秀)，〈亡國篇〉，《安徽俗話報》，8(1904.7)，頁1。

政治上的問題，並不是國家本身的問題，因為外國人只拿住了中國政府，並未把中國沈到大海中，也未把中國搬到外國去。我們應該懂得國家和政府之分。⁸⁹

這個「日本留學生」就是他自己，文中所記述的正是他寫〈亡國篇〉這段話的背景。1902年，章太炎、秦力山(1877-1906)等人在東京發起「支那亡國二百四十二年紀念會」，說明朝覆亡就等於中國亡國，宣傳反清思想。陳獨秀〈亡國篇〉的這段話，就是譏諷章太炎等革命黨人不懂得國家和朝廷之分，不懂得「滿洲人主中國，只是亡朝，並非亡國」的道理。

陳獨秀說「不知從那裡拾得了『國家和朝廷有別』這句話」，雖然顯示他在〈亡國篇〉寫這段話有點信手拈來的隨意性，但是其中卻透露了相當重要的訊息。他在這裡隱而不談的，「國家和朝廷有別」這句話其實是從梁啟超那兒「拾得」的。我們在前文曾說，陳獨秀轉為「亂黨」後，還是持續受到梁啟超言論，特別是《新民說》的影響，這就是一個例子。梁氏最早談到國家和朝廷有別的文字，是他在1899年《清議報》第24冊翻譯日人尾崎行雄(1858-1954)所著《支那處分案》書中第二章「支那之運命」，文中指出中國人(支那人)常說朝廷就是國家，在朝廷以外，不知道有國家。「支那人未知國家為何物，安得有國家思想乎？」梁氏在譯文後附記說：把朝廷視為國家，實在是中國弱亡最大的病源，數千年大國只有朝代名而沒有國名，最主要的原因是「不知國家與朝廷之大別也」。⁹⁰以後梁氏多次提到這個觀念，如

⁸⁹ 實(陳獨秀)，〈國家主義者眼中的國家和政府之分〉，《嚮導週報》，187(漢口，1927.2)。

⁹⁰ 尾崎行雄著，梁啟超譯，〈論支那之運命〉，《清議報》，第24冊(橫濱，1899.8)，頁13。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一書對此也有討論，見該書頁201-202。

《新民說》中有一節「論國家思想」，他把國家思想分四義討論，其第二義「對於朝廷而知有國家」，就是討論朝廷和國家的關係。他說：「有國家思想者，亦常愛朝廷；而愛朝廷者，未必皆有國家思想。朝廷由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代表，愛朝廷即所以愛國家也；朝廷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則朝廷為國家之蠱賊，正朝廷乃所以愛國家也。」⁹¹梁氏在〈新史學〉一文(1902年)也指出中國舊史之病有四端，第一為「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他批評過去寫作歷史的人，「皆為朝廷上之君若臣而作，曾無有一書為國民而作者也，其大蔽在不知朝廷與國家之分別，以為舍朝廷外無國家」。⁹²梁氏討論的是朝廷與國家有別的觀念，而未涉及現實政治的滿漢問題。陳獨秀便是拿這個觀念來譏諷章太炎等革命黨人「無知識」，他認為「滿洲入主中國，只是亡朝，並非亡國」，確實反應他在反滿的立場上不像章太炎等人那麼尖銳，而與梁啟超更為接近。不過，他對滿漢問題的態度也不是那麼明確，以他在《安徽俗話報》所寫的文字來看，固然〈本國大略〉一文說：「全國人種，分為四族：一曰漢族，人數最多，有四萬萬，……；一曰通古斯族，人數有五百萬，從前住在滿洲地方，現在的朝廷，就是此族；……」⁹³從這句話看來，是把滿族(通古斯族)包含在全國人種之中，但是他又強調全國人口有四萬萬，似乎把漢族以外的其他族排除在外。而在另一篇〈中國歷代的大事〉中他又有完全不同的說辭，這篇文章開頭就說：「世界上的人種，共分五大族：一是黃色種，一是白色種，一是銅色種，一是黑色種，一是紅色種。黃色種又分五樣：

91 梁啟超，《新民說》(臺北：臺灣東華書局，1978)，頁 16-17。

92 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九(臺北：中華書局，1978)，頁 2-3。

93 三愛(陳獨秀)，〈本國大略〉，《安徽俗話報》，6(蕪湖，1904.6)，頁 14-15。

一是漢種，一是韓種，一是通古斯種，一是蒙古種，一是土耳其種。我們中國人，就是黃種中的漢種。」⁹⁴這分明是認為黃種中的漢種才是中國人，滿族不是。同一篇文章中他多次強調「我們漢種」、「我們漢種人」。〈亡國篇〉也有「我漢種人」的用語。⁹⁵即使在民國初年他寫的〈一九一六年〉一文，也說：「極東民族中，蒙、滿、日本為征服民族，漢人種為被征服民族。」⁹⁶這都流露他的漢族主義立場。

此外，他在清末交往的革命人士、參加的革命活動，也都帶有反滿的色彩。藏書樓演說會遭到官方禁絕後，陳獨秀跑到上海和章士釗、張繼共同編輯《國民日日報》。該報是繼承被查封的革命黨刊物《蘇報》而創立，論調雖然較《蘇報》舒緩，但是承襲《蘇報》的反滿革命宗旨。⁹⁷陳獨秀在《國民日日報》上除了有署名的兩首詩之外，是否還有其他文字現在已無法得知，不能據以為他思想的論證。不過，根據章士釗記述，在上海主編《國民日日報》期間，他和陳獨秀、何靡施(梅士，?-1904)「三人同居一室，夜抵足眠，日促膝談，意氣至相得」。⁹⁸章士釗具有鮮明的反滿革命思想，陳獨秀如果沒有反滿的思想，怎麼可能和章士釗「意氣至相得」？更具體的例證是，陳獨秀在1904年秋天曾經加入革命暗殺的組織。據章士釗記述，1904年

⁹⁴ 三愛(陳獨秀)，〈中國歷代的大事〉，《安徽俗話報》，3(蕪湖，1904.5)，頁12。

⁹⁵ 三愛(陳獨秀)，〈中國歷代的大事〉，《安徽俗話報》，4(蕪湖，1904.5)，頁11；7(蕪湖，1904.7)，頁13；三愛(陳獨秀)，〈亡國篇〉，《安徽俗話報》，8(蕪湖，1904.7)，頁4、10。

⁹⁶ 陳獨秀，〈一九一六年〉，《青年雜誌》，1：5(上海，1916.1)，頁2-3。

⁹⁷ 章行嚴(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389；馮自由，《革命逸史》，第1集，頁195。

⁹⁸ 爛柯山人(章士釗)，〈雙枰記〉，《甲寅雜誌》，1：4(東京，1914.11)，頁6。

他和黃興(1874-1916)組織華興會，黃興計劃於這年 11 月在湖南起義，他在上海籌劃革命事宜，租賃招待所，做為革命黨人會合處所。為了避免事機外洩，另外成立愛國協會，秘密策劃行動，由楊篤生(1872-1911)主持，只邀「內層志士」加入，陳獨秀、蔡元培、蔡鍔(松坡，1882-1916)等人都由楊篤生監誓加盟。⁹⁹陳獨秀在蔡元培逝世後寫了一篇感言，也述及此事：

我初次和蔡先生共事，是在清朝光緒末年，那時楊篤生、何海樵、章行嚴等，在上海發起一個學習炸藥以圖暗殺的組織。行嚴寫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這個組織。住上海月餘，天天從楊篤生、鍾憲鬯試驗炸藥。這時子民先生也常常來試驗室練習、聚談。¹⁰⁰

陳獨秀加入的這個暗殺團以謀刺清廷大臣為目的。他後來回到蕪湖安徽公學擔任教員，和柏文蔚、常恆芳(1882-1950)等人成立岳王會，其宗旨是承繼岳飛(1103-1142)誓死抵抗遼金的精神，進行排滿革命。總會設在蕪湖，由陳獨秀擔任會長。¹⁰¹從這些事例，都可以看出陳獨秀確實具有相當的反滿思想，也實際參與反滿行動。

任建樹還引用陳獨秀於 1924 年 10 月在《嚮導週報》寫的〈辛亥革命與國民黨〉一文，做為陳獨秀在清末不強調排滿的證據之一。陳在這篇文章指出，辛亥革命有三個重大的錯誤導致它失敗，第一就是

⁹⁹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2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2)，140-141；亦收入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 8 冊(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 313-314。

¹⁰⁰ 陳獨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後感言〉，收入陳獨秀，《實庵自傳》，頁 123。

¹⁰¹ 柏文蔚，〈五十年經歷〉，收入《近代史資料》，1979：3(北京，1979.7)，頁 8；常恆芳，〈記安慶岳王會〉，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 4 冊，頁 438-439。

把排滿當做革命唯一的口號，以煽動感情為唯一工具，專事感情的排滿運動，而忽略民眾真實的物質要求，如對外收回權利(礦山、鐵路等)，對內反對中央官有企業(浙路、川路等)；第二是專力軍事行動，輕視民眾宣傳及黨的訓練；第三是左派首領過於和右派妥協。左派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派，抱持三民主義革命的理想；右派是黃興為首的湖南派，抱定簡單的排滿理想。¹⁰²我們細繹陳獨秀此文的意旨，是不認同黃興等人專重排滿的革命路線，他認為大多數革命黨人以為滿清倒了一切事物就會變好，而沒有民主共和的信念，這樣的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也就是希望革命黨人除了排滿之外，還要對民主共和抱持真確的信念。他的「不強調」排滿，應當從這樣的角度去了解，而不能解讀為他在思想上沒有滿漢的界線。他此時的至交章士釗對同盟會的態度，或許也有助於我們了解他的想法。章士釗具有強烈的反滿思想，而且曾經付諸實際行動，但是在孫中山、黃興強力游說，甚至以禁閉手段誘迫之下，還是拒絕加入同盟會。最主要的原因，是1904年11月他和革命黨人萬福華(1865-1919)等人策劃在上海英租界金穀香番菜館暗殺前廣西巡撫王之春，結果事機破敗，牽連革命黨人黃興、郭人漳(?-1922)、張繼等十餘人被捕。¹⁰³在自責甚深之餘，他對同盟會的革命策略以及自己適合擔任的角色有了新的思考和堅持。他自述道：

¹⁰² 陳獨秀，〈辛亥革命與國民黨〉，《嚮導週報》，86(上海，1924.10)。

¹⁰³ 王之春原任廣西巡撫，1903年4月有日本報紙刊載，他為了鎮壓廣西會黨起義，向駐軍越南的法國請求援助，並向法國亨達利洋行借款，以廣西全省路礦做抵押。消息傳出，上海革命維新人士紛紛痛斥他賣國，發起拒法運動。事後雖然證明日本報紙的消息為謠傳，但是他不久被革職。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他到上海和駐上海的俄國外交官聯絡頻繁，革命黨人將他視為「聯俄派」代表，策劃暗殺他。章士釗在〈書甲辰三暗殺案〉一文中敘述萬福華暗殺王之春事件的經過極為詳細，該文收入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8冊，頁171-176。

上海之新敗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敵，潛懷我殺伯仁之懼，蓄願為周處之思；加以未達壯年，了無學殖，人眾茫然無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機猶小，將來誤事必大；願假數年之力，隱消大過之媒。際茲大黨初建，應以分工為務，量其才力，資其性分，緩急文武，各任所宜。吾於焉發議，本黨大隊趨重實行，小隊容其攻苦，審時度勢，或庶幾焉。¹⁰⁴

章士釗所謂「緩急文武，各任所宜」、「大隊趨重實行，小隊容其攻苦」，意謂多數革命黨人注著重激烈的革命行動，但是應有少數人盡力於文字宣傳工作，一武一文，一急一緩，適才適性而為。章士釗在革命路線和策略的主張上和孫、黃歧異，是他堅持拒絕加入同盟會的最重要原因。陳獨秀和廣東、浙江的革命人士較為疏遠，岳王會在安徽自成系統。1907年徐錫麟計劃聯合浙江、安徽二省革命勢力起事，岳王會曾參加密謀，事敗後岳王會會員受到牽連，陳獨秀也因此逃到日本。¹⁰⁵他對革命行動感到灰心，加以不認同黃興等人的革命策略，而希望做根本改革的事業，才是他不願加入同盟會的真正原因。

陳獨秀於1907年第三度赴日，進入東京英語正則學校，學習英

¹⁰⁴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頁142；亦收入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第8冊，頁314-315。王之春原任廣西巡撫，1903年4月有日本報紙刊載，他為了鎮壓廣西會黨起義，請求駐軍越南的法國援助，並向法國亨達利洋行借款，以廣西全省路礦做抵押。消息傳出，激起上海拒法運動，革命維新人士斥責他賣國。事後雖然證明日本報紙的消息為謠傳，但是他不久被革職。1904年日俄戰爭期間，他到上海和駐上海的俄國外交官聯絡頻繁，革命黨人將他視為「聯俄派」代表，策劃暗殺他。章士釗在〈書甲辰三暗殺案〉一文中敘述萬福華暗殺王之春事件的經過極為詳細，該文收入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8冊，頁171-176。

¹⁰⁵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頁76-78。

文、法文，同時研讀西方各種主義學說，並且對佛學發生興趣。1909年9、10月間回國到杭州，在杭州隱居一段時間。¹⁰⁶不久接到長兄孟吉在瀋陽病逝的惡耗，到瀋陽扶棺返回故里，懷著悲慟之情繼續過隱居的生活。他在1907年以後事實上已經脫離革命的隊伍，沒有參加任何革命活動。在杭州的生活，除了和朋友以詩酒自娛之外，就是沈浸於書畫、文字學之中，思想心境處於消沈、煩悶、彷徨的狀態，絲毫尋不到「積極將作之計」。直到1911年春節後，在杭州陸軍小學謀了歷史、地理教員的職位，才結束隱居生活。¹⁰⁷陳獨秀在民初曾寫信給章士釗說：「僕本擬閉門讀書，以編輯為生。」¹⁰⁸後來掀開思想革命、文學革命，創建共產黨，左右中國政治的發展，完全是因緣際會，並非事先計及。

五、結語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清廷內憂外患交逼，一些思想較為敏銳的知識分子，感到國家民族處於危急存亡之秋，認識中國屢遭列強挫敗，武力不能匹敵只是國力衰弱的表徵，根本原因在於中國的舊體制阻滯進步，必須從政治、教育等各方面仿效西方的辦法進行變革，才能夠競勝於世界。康、梁以歷史進化論為理論基礎，提出變法的主張，對當時的官紳知識界造成極大的震盪。陳獨秀早年思想便是受到康、梁的啟蒙，開始揚棄科舉，轉趨新學。他參與創辦安慶藏書樓，和安慶

¹⁰⁶ 張湘炳，〈陳獨秀早期活動資料補絮〉，《近代史研究》，1984：2(北京，1984.3)，頁314-316。

¹⁰⁷ 張湘炳，〈陳獨秀早期的兩組「佚」詩考析〉，《安徽史學》，1985：1(合肥，1985.2)，頁14-16。

¹⁰⁸ cc生(陳獨秀)，〈生機(致甲寅雜誌記者)〉，《甲寅雜誌》，1：2(東京，1914.6)，「通信」欄，頁15。

的有志之士有進一步的結合，並且離開較為閉塞的家鄉到日本留學。他在日本接觸更多新的學說，而且和東京傾向革命之士往來密切，思想上逐漸轉為革命派。1903年東京和上海展開拒俄運動，他在安慶藏書樓舉行拒俄演說會響應，表現強烈的愛國思想。拒俄運動受到清廷遏抑，中國境內和東京留學生界革命思想一發不可遏抑，他對革命的熱情也更為熾烈。

他從「康黨」轉為「亂黨」，從事實際的革命活動，但是始終重視以言論文字對民眾啟蒙，從根本進行改造，因此投注相當多的心力在主編《國民日日報》和《安徽俗話報》上。他這種從根本改造的信念，其實還是受到梁啟超的影響。這個信念一直延續到《新青年》時期，成為他和胡適合作盡力於文化思想工作的重要基礎。而他在民初始終抱持的進化論思想，最早也是受到康、梁的啟迪。由此可見陳獨秀雖然從「康黨」轉為「亂黨」，但是梁氏對他的影響依然持續。

陳獨秀在清末受到民主學說、革命思想、無政府主義等各種思潮的影響，整個思想是雜糅的，尚未形成有系統的想法。從他早期的言論來了解他的思想發展脈絡是絕對必要的，但是必須留意先入為主之見帶來的危險。把他的言行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中來檢視，可以得到更客觀的觀察。陳獨秀確實是安徽思想和革命行動的先驅者，在晚清時期就表現勇於挑戰現狀和權威的精神，但是平實而言，他的影響力只限於安徽地區。岳王會沒有發揮顯著的革命作用；《安徽俗話報》對歷史、科學、教育、實業的介紹，表現他改造社會的理想，和其他的白話報比較也不顯得特別出色。他對民主共和的論述很少，闡發較多的是國家思想和愛國心的重要。而他的這些政治言論也沒有超過梁啟超、譚嗣同(1865-1898)、鄭觀應、孫中山等人論述的範圍。章士釗在1926年曾評述晚清時期的陳獨秀說：「然考之於言，則空無所有。時與香山蘇子穀，共譯蠶俄小說，極寫人類困頓流離諸狀，顏曰慘社會，

所懷政想，盡與此同，蓋消極衝挾[決]之意九，而積極將作之計不得一也。」¹⁰⁹章士釗寫這段話時，和陳獨秀已經交惡，未必完全客觀，不過陳獨秀在晚清思想界確實尚未綻放光芒。而他說陳獨秀「消極衝挾[決]之意九」，則是很深切的評述。陳獨秀後來在《新青年》對舊禮教發動攻擊，建立共產黨，要對中國政治社會做全面性的改造，便是此種特性淋漓盡致的發揮。

(本文於 2019 年 9 月 24 日收稿；2019 年 11 月 14 日通過刊登)

* 本文承蒙歐陽哲生教授、劉季倫教授、黃克武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同仁、《新史學》兩位匿名審查人和編輯委員會惠賜許多寶貴意見，謹此深致謝忱。

¹⁰⁹ 孤桐(章士釗)，〈吳敬恆—梁啟超—陳獨秀〉，《甲寅周刊》，1：30(北京，1926.2)，頁6。蘇子穀即蘇曼殊，陳獨秀和他共同翻譯(更正確地說，是蘇曼殊翻譯，陳獨秀潤飾修改)法國文豪維克多·雨果(Victor Marie Hugo, 1802-1885)的《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把作者譯為「羆俄」，書名譯為《慘社會》，連載於《國民日日報》上。這部小說描寫法國大革命時期各階層人民受到根深蒂固的壓迫，處於長期絕望，終至採取反抗行動，反映半個世紀巴黎社會的巨大變化。由於報紙停刊只譯了一半，以後出單行本才譯完全部。兩人的翻譯並不忠實於原著，亂添亂造的地方不少。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 報刊

- 《大公報》(天津)。
- 《中外日報》(上海)。
- 《甲寅周刊》(北京)。
- 《甲寅雜誌》(東京)。
- 《同文滬報》(上海)。
- 《安徽俗話報》(蕪湖)。
- 《京話報》(北京)。
- 《杭州白話報》(杭州)。
- 《時務報》(上海)。
- 《國民日日報》(上海)。
- 《清議報》(橫濱)。
- 《新青年》(《青年雜誌》)(上海、北京)。
- 《嚮導週報》(上海)。
- 《蘇報》(上海)。

(二) 原始資料

- 〈安徽省城大學堂第一次衝突的原因〉，《蘇報》，1903年5月26日，頁2-3。
- 〈安徽愛國社擬章〉，《蘇報》，1903年6月7日，頁3。
- 〈安徽愛國會之成就〉，《蘇報》，1903年5月25日，頁1-2。
- 〈安徽愛國會演說〉，《蘇報》，1903年5月26日，頁2。
- 〈海上熱力史〉，《蘇報》，1903年5月6日，頁1-2。
- 〈論中國學生同盟會之發起〉，《蘇報》，1903年5月30、31日，頁1。

- 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包天笑，《鈞影樓回憶錄》，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9。
- 由己(陳獨秀)，〈題西鄉南洲游獵圖〉，《國民日日報》，1903年8月17日；亦收入羅家倫主編，《國民日日報彙編》，第1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8，頁16-17。
- 任建樹等編，《陳獨秀著作選》，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 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安慶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合編，《辛亥革命在安徽》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
- 吳稚暉，〈自蘇報案至赴歐日記〉，收入羅家倫、黃季陸主編，《吳稚暉先生全集》，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1969。
- 汪原放，《回憶亞東圖書館》，上海：學林出版社，1983。
- 汪康年，《汪穰卿筆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9。
- 汪詒年編，《汪穰卿先生傳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 房兆楹輯，《清末民初洋學學生題名錄初輯》，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 政協安徽省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組，〈辛亥前安徽文教界的革命活動〉，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377-386。
- 柏文蔚，〈五十年經歷〉，《近代史資料》，1979：3(北京，1979.7)，頁8。
- 胡適，《四十自述》，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0。
- 軍國民教育會自印，《軍國民教育會紀事》，收入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1901-190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頁93-95。
- 常恆芳，〈記安慶岳王會〉，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4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438-441。
-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代出版史料初編》，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 梁啟超，〈《清議報》一百冊祝辭並論報館之責任及本館之經歷〉，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六，臺北：中華書局，1978，頁52。
- 梁啟超，〈新史學〉，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九，臺北：中華書局，1978，頁2-3。
- 梁啟超，〈變法通議〉，收入梁啟超，《飲冰室文集》，之一，臺北：中華書局，1978，頁8。
- 梁啟超，《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78。

- 梁啟超，《新民說》，臺北：臺灣東華書局，1978。
- 章士釗，〈書甲辰三暗殺案〉，收入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第8冊，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頁171-176。
- 章士釗，〈疏黃帝魂〉，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1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217-304。
- 章士釗，〈與黃克強相交始末〉，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會編，《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集，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138-149。
- 章行嚴(士釗)，〈蘇報案始末記敘〉，收入中國史學會主編，《辛亥革命》，第1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頁387-390。
- 章含之、白吉庵主編，《章士釗全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
- 陳獨秀，〈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新青年》，2：4(上海，1916.12)，頁1-7。
- 陳獨秀，〈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新青年》，2：2(上海，1916.10)，頁1-4。
- 陳獨秀，〈蔡子民先生逝世後感言〉，收入陳獨秀，《實庵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頁123-127。
- 陳獨秀，《實庵自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
- 馮自由，《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
- 楊天石、王學莊編，《拒俄運動，1901-1905》，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
- 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收入上海通社編，《上海研究資料續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8，頁84-99。
- 闕名，〈安慶藏書樓革命演說會〉(安徽省博物館藏未刊稿)，收入張湘炳等編，《辛亥革命安徽資料匯編》，合肥：黃山書社，1990，頁166。
- 爛柯山人(章士釗)，〈雙桴記〉，《甲寅雜誌》，1：4(東京，1914.11)，頁1-16。
- 顧炎武，《日知錄》，收入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整理，《顧炎武全集》，第18冊，上海：上海世紀出版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二、近人論著

- 戈公振，《中國報學史》，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76。
-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
- 任建樹，《陳獨秀大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 任建樹，《陳獨秀傳——從秀才到總書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 任建樹主編，《陳獨秀著作選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1901-191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沈寂，《陳獨秀傳論》，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
- 波多野乾一編，《資料集成中國共產黨史》，東京：時事通信社，1961。
- 鄧玉汝，《陳獨秀年譜》，香港：龍門書店，1974。
- 唐寶林，《陳獨秀全傳》，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1。
- 唐寶林、林茂生編，《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 唐寶林主編，《陳獨秀研究文集》，香港：新苗出版社，1999。
- 祝彥，《陳獨秀思想評傳》，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
- 張玉法，《清季的革命團體》，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
- 張杰，《清代科學家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 張湘炳，〈陳獨秀早期的兩組「佚」詩考析〉，《安徽史學》，1985：1(合肥，1985.2)，頁 14-16。
- 張湘炳，〈陳獨秀早期活動資料補絮〉，《近代史研究》，1984：2(北京，1984.3)，頁 314-316。
- 莊華峰、劉和文，〈何熙年與皖省藏書樓〉，《國家圖書館學刊》，2006：3(北京，2006.7)，頁 85-89。
- 陳力，《中國古代圖書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
- 陳萬雄，《新文化運動前的陳獨秀，一八七九-一九一五年》，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2。
- 舒習龍，〈姚錫光生平及其成就初探〉，《長江論壇》，2007：1(武漢，2007.1)，頁 74-78。
- 鄔國義，〈陳獨秀早年事迹的新資料〉，《近代史研究》，2003：2(北京，2003.3)，頁 227-235。
- 鄭學稼，《陳獨秀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9。
- 蕭公權著，汪榮祖譯，《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Chang, Hao. *Liang Ch '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Levenson, Joseph R. *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Lee, Feigon. *Chen Duxiu: Founder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
- 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From “Reformist” to “Revolutionary”: A New Exploration of Chen Duxiu’s Early Thought and Activities

Ta-chia L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Chen Duxiu is an important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political history. Examining his early thought and activities will give us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his thoughts. There have been many studies of Chen, but these include some mistakes.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his thought and activitie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 focuses on four main points. First, in 1903, Chen Duxiu gave a speech against the treaty with Russian in the Anqing Library, which was his first public political activity. This spee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Anhui revolutionary movement. This article finds that he had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Anqing Library and had close contacts with those who advocated new ideas in Anqing. This clarifies the background of his first trip to Japan in 1901, and why he was able to give this speech in 1903. Second, Chen Duxiu founded the Anqing Patriotic Association in 1903. Past research has misinterpreted the time as 1902 because of errors in citations. These studies thus led to the conclusion that Chen had changed from a “reformist” to a “revolutionary” at that moment. This error has been repeated for forty years. Third, many scholars have overestimated the influence of Chen Duxiu’s early thought and political activities on the basis of

his later prominence in the political and intellectual vanguard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he was already in the vanguard in the Anhui region during the late Qing, but his impact was regional. His interpretations of nationalism, science, and democracy were very basic and did not go beyond what Liang Qichao and others were already saying. Fourth, the important elements of Chen Duxiu's thought at the time, such as nationalism and the theory of evolution, were directly inspired by Kang Youwei and Liang Qichao. After Chen became a revolutionary, he still believed in fundamental transformation. Liang Qichao's influence on him continued until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or longer.

Keywords: Chen Duxiu, Liang Qichao, reformist, revolutionary, Anqing Library